

石峁城地处黄土高原北部,位于陕西省榆林市东北100多千米秃尾河北岸的山岭上,是一座巨大的石城。石峁城依山而建,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墙呈半包围状,将皇城台环抱。城内面积达400余万平方米,城的主体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前1900年。作为中国青铜时代早期规模最大的石城建筑,石峁城的发现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和进程研究有重要意义。

石峁城中最雄伟复杂的建筑遗迹是“皇城台”和外城的东城门。皇城台位于石峁城的核心区域,发掘者推测其已经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或称其为“王的居所”,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早期宫城。皇城台台体顶部面积约8万平方米,底部面积约24万平方米,四周有护坡石墙,石墙自下而上逐阶内收,保存有7~9级,整体呈台阶覆斗状之势,总高度超70米,高大巍峨,气势恢宏。

皇城台遗址废弃堆积中出土各类文物达4万余件,其中包含骨针1万余枚及大量骨针制作残料——如此多的骨针,无疑将引发学界对石峁骨针实际用途的思考。另有口簧20余件,推测吹奏口簧可能与宗教活动有关。其余为大量的陶片,多为筒瓦、板瓦等陶瓦残片,由此可知当年皇城台建筑的雄伟与富丽堂皇。经陶片拼对辨识,确认陶甬20件,这些陶甬显然具有宗教性质。此外,东城墙北段墙顶还有成层分布的100余件卜骨。值得注意的是,出土遗物中实用器物极少,只有少量的单把鬲、盂,还有零星的几件铜器。根据这些发现,发掘者也意识到这“暗示着作为皇城台的宗教与信仰内涵”。

皇城台文物遗存中,最重要的发现为石雕。石雕工艺包括柱状圆雕和平面雕两大类。柱状圆雕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一件神面石雕。一件为30号石雕,出土于大台基南护墙西部墙体的倒塌堆积中,长径22厘米、短径19厘米、高62厘米。柱顶部弧隆,中央有一个小圆窝,圆窝四周浅浮雕八片蕨叶形瓣片。石柱整体呈男根状,柱体前后宽面用浮雕手法刻出人物形象,人物形象均为菱状环眼略向外上方斜视,工状凸出的鼻梁。两人物分别为男性和女性,二者身体结构一致。男性额头眉脊稍隆,呈直角云状,鼻翼宽敞,阔嘴露齿,嘴下的“U”形勾云饰,为抽象卧姿的男性双腿。另一面女性眉脊舒卷,鼻梁挺直,鼻梁高耸,小嘴微张,未表现牙齿。脸颊有卷发饰。人面雕下部凸显出水滴状表现的是女阴,两侧下部对称的倒水滴状则是仰卧状女性的双腿。整个石柱及其雕像呈现的男女双体艺术形象,可称为双性人物石雕。另一件为47号石雕,出土时仍矗立在大台基南护墙中部偏西的夹道地面上,高出夹道地面1米,被南护墙墙体的倒塌堆积(3层)覆盖。整体结构同30号石雕,石雕寓意相同,仅身体五官表现得更为抽象,更具神寓(图1)。

目前,在已发现的考古遗存中,可以与皇城台柱状神面石雕进行比较分析的是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遗址的双性石人。这件双性石人由一略呈扁方形的柱状石雕而成,双性石人整体用敲凿、雕磨法在柱状石的四面表现女阴、男根、人面和平踵的下体,其主题思想是男女交合。石人高61.5厘米,年代与石峁遗址大体相同,两者有相通的神寓(图2)。康家石门子岩画与罗布淖尔小河文化关系密切,小河文化与东天山林雅文化关系密切,小河文化和林雅文化又与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关系密切,石峁遗存更表现出与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密切关系。可以从文化联系的视野探寻石峁双性石雕出现的文化背景。

平面石雕多见于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少部分塌落于夹道内。石峁皇城台平面石雕上的纹样,最重要的是神面纹(图3)和神兽纹。石雕中的神面纹可以推测为石峁祖先的神格化形象。如果说石峁城是传说中的黄帝所居,这里的神面可能与黄帝的神格化形象有关;如果石峁城为夏初夏王朝统治者所居,则与夏禹的神格化形象有关。皇城台二方连续平面石雕中,神面两侧的曲

石峁城的性质刍议

刘学堂

体爬行动物是蜥蜴的神格表现(图4),所见神面两侧的勾云纹是蜥蜴肢爪的抽象化和符号化表现。皇城台石雕中无足的细长曲线纹动物是形象的蛇纹。蛇与蜥蜴是石峁统治者神格的动物载体,它们是龙的主要原型。五帝到夏,是华夏族集团形成的关键时期,龙是华夏集团形成的徽记标志,是夏人的图腾。龙图腾的构图主体是将蛇和蜥蜴糅合为一体,通过在蜥曲的蛇体上,画蛇添足,添加上蜥蜴灵活的四足而创造出来了龙体,最终形成于二里头、齐家和三星堆文化中镶嵌绿松石铜牌中的龙纹,特别是铜牌中的龙纹,定格成夏人的图腾。龙纹图腾和图腾动物的原型,除见于上述考古文化外,还见于石峁和陶寺文化。龙纹图腾和图腾动物的原型在这些考古文化中的发现并非偶然,是因为它们的所在均是夏人先祖活动和夏王朝兴起的“夏墟”之地。石峁石雕是神庙建筑的构件,孙周勇、邵晶认为其或为“庙堂之物”,柱状石雕或为“图腾柱”。皇城台本体及其重要的附属建筑明显具有神庙的性质。韩建业认为皇城台或许是祭祀黄帝的圣台。

在石峁城建筑遗存中,规模与复杂度仅次于皇城台的是外城东城门。水涛曾言“石峁的东城门遗址单视为一个城门的话,体量和结构太过复杂,功能上还需要再探讨”。外城东城门是中国目前所见时代最早,规模最为宏大,结构最为复杂、神秘的城门。城门由内外两重瓮城、门道、相对相望高大雄伟的墩台,以及门塾、马面等设施组成。内瓮城的墙体装饰斑斓,用红、黄、黑、绿四种颜色绘出几何图案。东城门气势恢宏、威严高大、庄严神圣、神秘华丽,被誉为“华夏第一门”。外东城门不是一般世俗意义上的城门,从其的高大与雄伟、结构的复杂、华美的装饰,以及墙体藏玉等结构与遗存看,无不充斥着神秘与神圣,当与石峁社会迎送神灵所举行肃穆、神圣、神秘和复杂的宗教仪式有关,可以称为“神阙”。城门附近发现的人头祭坑有6处之多,当与外东城门的“神阙”性质有关。据此,发掘者也认为外东城门是“石峁统治者构建的精神屏障”。

石峁城建筑的神秘之处还在其大量用玉。这些玉器除藏于墙外,考古工作者在外城三号门址外东南方向的开阔坡地上发现一处石堆遗址,命名为“石峁一号祭坛”。在该祭坛顶部采集到一件玉铲。戴应新先生著录的126件玉石器,很大一部分来自东城门东北300米处,据当地农民介绍,在大规模平整土地之前,此处曾分布着类似一号祭坛的高大石堆。结合神木新华遗址曾发现一处浅坑(深22厘米)内埋藏着36件玉器,石玉器或藏于墙体,或为祭坛上的通神之物。辉煌时期的石峁城,形成了从外城东城门“神阙”,经藏玉的神阙神道,抵达皇城台神庙的空间格局。石峁城建筑的性质,与其说是世俗王权的都城、宫殿,不如说是一座迎神、送神,具有与天地沟通功能、结构复杂而宏伟的宗教性建筑。

文明的产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有文明的萌芽,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文明的雏形,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区域文明体,重要的如红山、良渚、石家河文明,这些文明体的突出特征是有巨大祭坛、大量而神秘的神玉器、陶器等。社会活动和生产的主要目的,是要动员社会最重要力量,调配社会最主要的物质资源,制作大量的神器,以保证神的需要,属于神权文明的发展阶段。石峁古城的发现表明在中国早期文明发展历程中,神权文明至此发展到了一个最高的形态、阶段。由石峁、陶寺遗址到二里头遗址的结构与性质看,这一时期文明形态演进的轨迹是由石峁、陶寺主导的文明,过渡到了二里头广域的王权主导的文明,从而步入中国三代文明发展与辉煌的新阶段。对石峁城神权文明性质的判断,在研究中国早期文明的进程与性质上具有非凡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3VXJ015)成果。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图1 神面人物圆雕



图3 石峁石雕中的神面纹(3发现时就是倒置)



图4 皇城台二方连续神面动物石雕



图2 新疆康家石门子岩画遗址双性石雕



图5 以往未见有此类设计,此型亦为夏人铜戈铸造的创新,而后为商人学习和继承,此类尾端出横齿的设计亦见于安徽肥西

商都新证 问道早商

——郑州商城2025年度考古新发现专家提问解读

杨文胜

郑州商城遗址荣获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汇报阶段,刘庆柱、霍巍、施劲松三位先生围绕郑州商城新发现提出的关键问题,精准直击早商都城研究的核心议题。团队成员杨树刚现场受时间所限未能展开论述,本文以《商都新证 问道早商》为题,系统阐释对三大核心问题的学术回应。

郑州商城祭祀遗存东西分置与商代都城礼制格局的制度内涵

刘庆柱先生提出:郑州商城近年新发现的高等级祭祀遗存集中于城址西部,既往祭祀场所多位于东北部宫殿区附近,这一空间差异反映了商代都城与祭祀制度怎样的深刻变化?

结合最新考古资料可见,郑州商城祭祀遗存东西分置、功能明确的格局,正是后世“左祖右社”都城礼制的最早滥觞,直观呈现早商国家礼制体系的早期建构与成熟的功能分区意识。

郑州商城东北部宫殿区北侧的传统祭祀遗存,祭祀对象明确指向祖先神,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王室祭祀空间,承担后世“祖庙”功能,对应“左祖”制度内涵。城址西部新确认的完整祭祀遗存群,则形成“北庙、中天坛、南地坛”三级祭祀空间,共同构成早商“右社”体系的完整实物雏形,与东部祖庙区东西对称、功能分立。

郑州市河南省体育场祭祀遗存,以规整建筑基址,中心主祭祀坑、附属祭祀坑与外围夯土围墙构成封闭祭祀院落,具备早期“神庙”特征,祭祀对象为自然神祇与守护神祇,是独立于祖先祭祀之外的神祠祭祀实证。体育场南侧的张寨南街祭祀场(杜岭方鼎出土地),以中心夯土台为核心,周边有序分置青铜重器坑、殉人坑、殉牲坑,属露天高台祭祀布局,功能契合后世天坛,主要祭祀上天与日月星辰等天神系统,是早商国家级天神祭祀的专属场所。内城西南角夕阳楼祭祀遗存,以深井竖穴六土坑为核心,自坑底向上逐层规整放置陶器、贝壳、石块、卜骨、殉牲,部分叠压殉人,以深坑贴近地祇,专司土地神、社稷神祭祀,功能对应后世地坛,与南顺城街青铜窖藏隔城相望。

郑州商城东北部祖先祭祀(祖庙区)与西部“北神庙、中天坛、南地坛”社稷祭祀体系,形成有别、空间对称、层级清晰的東西分置格局,绝非零散遗存的偶然分布,而是早商王朝有意识的都城礼制规划成果。结合偃师商城“社居西、稷居东”、殷墟“宗庙居东、社祀偏西”的空间特征,可见早商已形成稳定的“祖东社西”布局雏形,为周代“左祖右社”礼制奠定直接源头。

周代在此基础上正式确立“左宗庙、右社稷”的都城礼制,并成为古代都城规划的经典范式。东周时期,郑韩故城、曲阜鲁国城、临淄齐故城、燕下都、秦雍城等列国都城,均呈现祖社分立的礼制格局,在遵循周制核心的同时开

展本土化实践。秦汉大一统王朝最终完成“左祖右社”制度定型,并沿用两千余年,成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核心传统。

刘庆柱先生提出的祭祀遗存东西分置问题,直击早商都城制度核心。郑州商城新发现以系统完整的实物证据,将中国古代“左祖右社”都城礼制的源头明确上推至早商时期,清晰展现中华礼制文明一脉相承、绵延发展的完整脉络,为阐释早期中国王朝国家的礼制建构与都城规划传统,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核心实证。

郑州商城冶铸遗址石范、陶范共存现象的冶金史内涵

霍巍先生关注郑州商城冶铸遗址石范与陶范并存的现象,追问其技术源流与族群互动背景。这一发现深刻揭示郑州商城在中国早期冶金史上的关键地位,直观呈现早商时期多元技术、不同族群在都城空间深度融合,并推动青铜冶铸体系迭代升华的历史进程。

本次出土石范与陶范的冶铸遗址,位于郑州商城中南部创新街小学新校区,是早商都城核心区重要的青铜生产场所。作为早商王朝政治、经济与技术中心,郑州商城是多元族群与技术体系交汇融合的枢纽。遗址内石范与陶范共存,本质是西来石范铸作传统与中原本土制陶传统深度结合的产物:掌握早期冶铸技术、携带石范工艺的西来族群,与深耕中原、制陶工艺发达的本地及东方族群在此交汇融合,推动形成郑州商城独特的青铜冶铸技术体系。

创新街小学遗址石范与陶范共存,是青铜工艺迭代演进的阶段性状态,并非贯穿整个早商时期的固定格局。郑州商城早期,石范、陶范并行发展,共同支撑都城青铜生产;至商代早期偏晚阶段,陶范工艺完全成熟并占据主流,石范逐步式微,仅少量用于兵器、工具等简单片状器物铸造。族群融合直接催生复合范铸造工艺,可批量铸造形制复杂、礼器属性明确的青铜重器,标志着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实现关键技术升华。

郑州商城不仅是早商权力中心,更是多元文化与技术交融的创新高地。其冶铸遗存所反映的技术迭代与族群融合过程,为阐释早期中国青铜文明的形成机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构建路径,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核心考古证据。

郑州商城手工业遗存城内分布的历史成因与城市功能演变

施劲松先生提出:本次新发现的手工业遗存均位于城内,以往发现多集中于南关外及城北河南饭店一带,如何理解空间分布差异及其历史动因?

本次城内手工业遗存的系统揭露表明,这一现象本质是郑州商城早期城市功能分区的动态演变,是自然环境变迁、都城规划与手工

业生产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郑州商城早期手工业生产本就规划于内城之内,并非“手工业均设于城外”的固有模式。郑州商城是以手工业文明为核心支撑的早期王朝都城,铸铜、制陶、制骨、制石等产业是都城运转与王朝统治的核心支柱,各类作坊在城内密集分布、有序布局,从事生产的族群属于商王朝统治体系内部,共同构成都城产业支撑。

城内手工业遗存分布严格依托都城水系网络系统。铸铜、制陶、制骨、制石等产业均需大量用水,形成“依水建坊、沿水布局”的规划特征。创新街小学青铜冶铸遗址、塔湾制骨作坊等,均紧邻城内水系,是早商手工业依水系布局的典型实证。

以往学界形成“手工业多分布于城外”的认知,本质是发掘局限与环境变迁造成的片面判断。此前城内大面积手工业遗存长期未被系统揭露,城外南关外、城北区因埋藏条件与发掘便利率先发现,进而形成固有印象。本次大规模系统发掘,完整还原郑州商城早期“手工业以内城分布为主”的原始格局。

郑州商城手工业从“城内集中”转向“城外布局”,核心诱因是二里岗上层二期(白家庄期)大型水害。此次水害严重破坏城内水系,作坊失去稳定水源,被迫向外迁移;向南迁至熊耳河沿岸,向北迁至金水河沿岸。城北河南饭店、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一带,正是金水河城外河段沿线,以往发现的铸铜、制骨遗存,正是城内作坊水灾后外迁的产物;南关外手工业遗存亦属同类。

综上,郑州商城手工业遗存从城内到城外的空间转移,并非都城规划理念的根本转变,而是水害引发环境剧变后的被动调整。本次城内手工业遗存的集中发现,还原了郑州商城早期“手工业内城布局、依水功能分区”的原始规划,颠覆了“商代都城手工业必设于城外”的传统认知,为研究早商都城规划、城市功能演变、人地互动关系,提供了全新的核心考古实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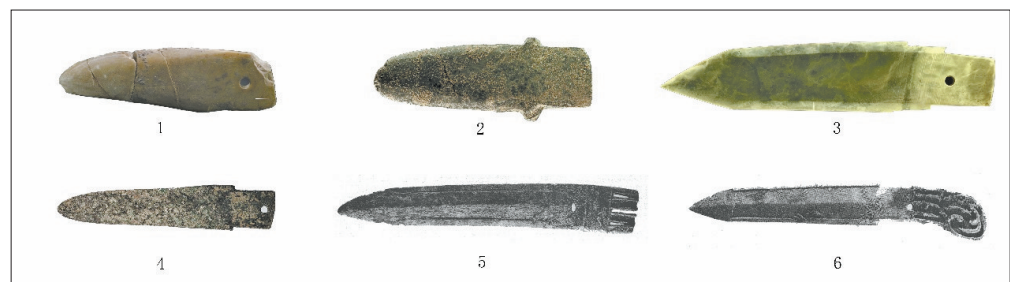
结语

刘庆柱、霍巍、施劲松三位先生提出的三大问题,以高度的学术洞察力精准锚定郑州商城都城制度、冶金技术、城市功能三大核心命题,既点明郑州商城作为早商王朝核心都邑的不可替代价值,也切中当前早商文明研究亟待突破的关键环节。郑州商城近年的考古发现与系统研究,不仅对三大核心问题作出完整学术回应,更以坚实考古材料解决了郑州商城在都城礼制、手工业布局、技术源流等方面的长期争议,清晰揭示早商王朝国家制度、城市功能与文明特质,充分彰显郑州商城在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与国家形态发展中的里程碑意义,为重建早商历史、阐释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道路提供了关键性支撑。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浅谈二里头遗址所出的兵器戈

苏军航 赵海涛



图一 二里头遗址玉石和青铜戈类型图

三官庙、河南新郑望京楼等遗址。

B型戈,1件,为1975YL VMK3.2,长27.5厘米,内部弧曲下垂,器表铸兽面纹并嵌绿松石片(图一,6),此设计亦为夏人首创,后为商人学习和发扬,流行于河南郑州商城、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北藁城台西、河南安阳殷墟等遗址。

从器物形制看,二里头所创制的无阑戈、出阑戈、饰横齿戈、曲内铸兽面嵌绿松石戈,在商代被全面继承。郑州商城、盘龙城、台西、殷墟所出之青铜戈或是玉石戈,无论朴素实用还是装饰繁缛,皆可在二里头找到原型。

从出土情境看,玉石戈的材质、尺寸、纹饰的有无和差异,乃至保存状态,当对应着不同的功用。A型玉石戈,除1972 III KM1.2因作为随葬品,属玉质,出土于墓葬中,保存完好外,余下均属石质,且多数仅存前缘或内面残缺,拼接修复后,仍可见明显的受力痕迹,此类应为日常使用后残缺,被弃置于灰坑或灰沟之中。B型玉石戈,均属玉质,保存完好,大而薄,刃部无使用痕,均出自等级最高的一级墓,与玉戚、玉刀、柄形器等礼仪用器共出,已超实用范畴,属礼仪用器。

从出土情境看,玉石戈的材质、尺寸、纹饰的有无和差异,乃至保存状态,当对应着不同的功用。A型玉石戈,除1972 III KM1.2因作为随葬品,属玉质,出土于墓葬中,保存完好外,余下均属石质,且多数仅存前缘或内面残缺,拼接修复后,仍可见明显的受力痕迹,此类应为日常使用后残缺,被弃置于灰坑或灰沟之中。B型玉石戈,均属玉质,保存完好,大而薄,刃部无使用痕,均出自等级最高的一级墓,与玉戚、玉刀、柄形器等礼仪用器共出,已超实用范畴,属礼仪用器。青铜戈,共4件,除2003YL V T34④B.3仅存援身残块,亦分A、B两型。

A型戈,2件,援身和内帮平直,无上下阑,内部设圆穿,又可分Aa、Ab两型。Aa型戈,为1982YL IV T33⑥.1,长约20厘米,通体无纹饰(图一,4),形制与较早的A型玉石戈无异,应是仿其制作的实用兵器,其选用青铜材质当为夏人首创。Ab型戈,为1975YL III 采集,60,长27.5厘米,内部饰三组平行细线纹,尾端出四条平行横齿(图一,5),以往未见有此类设计,此型亦为夏人铜戈铸造的创新,而后为商人学习和继承,此类尾端出横齿的设计亦见于安徽肥西

二里头以戈随葬标识身份的做法,开启了后世“礼兵”制度的先河。夏商政权更替之际,这种以戈为载体的礼制传统并未因族群间的兴衰而中断。二里头创制的玉、铜戈技术、形制和礼仪功能被商王朝全面继承,并发展至更系统化的阶段。与之相近的同类器物流行于郑州商城、盘龙城、殷墟等商代高等级墓葬中,其与鼎、爵等铜礼器共出,数量与精美程度可直接反映出墓主生前的身份和地位。而在器表铸造兽面嵌绿松石的做法,也已演化为商代高等级青铜兵器上常见的装饰设计,兽面与绿松石的组合成为权力与威仪的标识已然成熟。此外,在妇好墓中还见有外邦朝贡而来的玉戈“卢方人戈”。步入西周时期,戈更是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赐物体系,成为周天子赐命诸侯、册封臣属的信物。《尚书·牧誓》所载武王伐纣“称尔戈,比尔干”,表明戈不唯是实战兵器,更是聚合部众、宣示天命的那权力符号。而追溯这一传统的源头,二里头那些锋刃完好却非为单纯杀戮而作的戈,无疑是最初的关键环节。

二里头兵器戈的礼器化过程,很好地体现了二里头文化在中华文明史进程中的引领地位。玉石戈继承和发展了史前兵兵的礼仪内涵,青铜戈与铜容器爵、斝,则开启了以高精的青铜铸造技术服务于权力表达的新阶段。青铜戈对玉石戈的仿制,并非单纯的材质更替,更是礼制传统的传承。这种以兵器为外在载体、以礼制为精神内核的文化模式,自史前时期萌芽,夏代晚期创新,又经商周时代延续发展,最终沉淀为中华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阐释项目“二里头文化的融汇与辐射:以聚落形态和器物风格为中心”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